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139 期

139

彭诚信：从人脸识别第一案谈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蔡 昉：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一年六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993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2007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年和2010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

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照' (Hu Xizhao).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两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本基金会于2021年5月19日以视频方式举办了第165期上海发展沙龙，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凯源法学院副院长彭诚信先生作了题为“从人脸识别第一案谈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演讲。他指出，信息利用不能突破隐私底线。要保护好个人信息，第一，要靠我们技术上的加密。互联网中的密码学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个企业都使用密码，所收集的数据隐私都要保护好。第二，要在制度上严格地控制所有的企业，包括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已经掌握的信息不能轻易泄露出去，不能轻易解密。保护好我们的个人信息，我们的数字企业才会健康发展，否则会带来很多潜在的危害。第三，要靠立体的多元的法律来保护，除了民法，刑法也要有。我国的反垄断法现在建立起来了，很多案例涉及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还要靠行政监管，要靠国际化公约，只有靠这些法律、公

约的配合，才能把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好。

基金会于6月8日以视频方式举办了第166期上海发展沙龙，人口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先生作了题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的演讲。他指出，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了两个趋势：第一，总人口增长越来越慢，第二，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用65岁及以上人口作为老龄人口的标准，2020年达到了1.9亿，占比是13.5%，显示了我们未富先老的情况。这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1.30，总和生育率如此之低，是这次普查最重要的信息。总的来说，中国的生育水平不可能回到2.1这个更替水平，但是能够向它靠近就很好了，而且只要有靠近的趋势，多少都是有益的，都是影响未来的。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放开三孩的政策决定，我们下一步要做是必须使配套支持措施跟上，让三胎政策变成实实在在的有真金白银支撑的政策。根据国际经验，从人均GDP 1万美元到2万多美元这个区间，是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最快的时候。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我们面临着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任务，这个任

务既能解决后顾之忧，敢于生孩子；也能够解决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问题；还能解决创造性破坏，提高生产能力，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的问题；还能扩大消费，避免我们过早地受到需求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站在更高的长期发展的框架下，看人口变化的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目 录

彭诚信：从人脸识别第一案谈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1
蔡 昉：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	27

从人脸识别第一案谈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彭诚信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凯源法学院副院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65 期 2021 年 5 月 19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邀请你们参加本期上海发展沙龙。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最近高科技发展非常迅猛，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给我们工作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由于这些高科技发展，给我们个人的信息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著名教授、凯源法学院副院长彭诚信先生，对这个问题给我们做演讲，题目是“从人脸识别第一案谈民法典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下面我们就请彭教授给我们做演讲。



彭诚信（上海交通大学著名教授、凯源法学院副院长）：谢谢乔秘书长的邀请。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只能在网上见面，期待以后可以在线下。我准备得很充分，但是时间可能不一定够。我想讲六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个人信息；第二，个人信息到底应该归谁；第三，个人信息在法律上的权利性质是什么；第四，如何利用和保护个人信息；第五跟大家谈谈信息利用为什么不能突破隐私底线；最后是法律如何救济个人信息的侵害。

下面就谈一下什么是个人信息，先谈两三个大家熟知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二审刚判下来不久的“郭兵副教授诉杭州野生动物园”案件。严格来讲，在法律上这个案件并不是与人脸识别相关的，而是一个合同案件。大约 2019 年，郭兵教授和他的太太办了一张杭州野生动物园的年卡，当时录入的是指纹。过了几个月，动物园电话通知郭教授和他的太太，说现在不能用指纹了，需要用人脸识别了，需要两位再录一下人脸识别。这个时候郭教授就不同意。两边僵持，就诉讼了。其实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主要是作为一个合同案件来审理的。

为什么是合同案件呢？因为我买你的年卡，你让我用，到时候你随便改变一些履行方式，怎么行呢？法院判野生动物园给郭教授 1038 元的违约补偿。郭兵教授主张野生动物园不但要承担违约责任，还应把他录入的指纹信息删除掉，一审没有支持这个主张，二审支持要野生动物园把录入的指纹信息也删除掉了。这个案子的事由给我们启示很大，什么启示呢？为什么郭教授不让他们用人脸识别？人脸识别信息到底对我们老百姓影响有多大？如果大家关注网上的话，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劳教授也在网上呼吁，他们小区要录入人脸识别，她不同意，经过呼吁，最后小区没有用人脸识别。这反应出来人脸识别信息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有多重要，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都关注的，大家都知道有关特斯拉的一个维权事件，到今天其实还在发酵，因为这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案件。有一些信息我们只能从网上知道，但是未必一定准确，只是我们今天上课拿过来举例。大体信息大家都知道，上海 4 月 19 号，有一个刹车失灵的女车主在车展里

维权，被行政拘留几天，到现在与特斯拉之间进行了很多的争执。其中的一个争执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就是隐私信息到底应该归谁？特斯拉在事件发生后，公布过一分钟的数据。维权的女士和她的丈夫就说，特斯拉是不是侵犯隐私了？后来这个维权女和特斯拉公司一直在争执，在争执的时候特斯拉就说能不能把数据调出来，然后来公布。维权女的老公不同意。以后人工智能产品，像特斯拉这样的会很多。大家也知道，特斯拉最近又撞死了一个交警。这种数据，是谁有权利调出？公司有没有权力随便调出，还是这个信息的主人有权利调出，还是归公权力部门？这个维权女士的信息和特斯拉生产者所掌控的信息，谁有权来使用，谁有权来掌控，谁有权来维护？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案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在法律上是一个重要的案件。庞先生在“去哪儿网”买了一张东航的机票，之后收到航班取消需要改签提供银行卡的诈骗信息，实际上飞机并没有改签。事后庞先生认为，谁把我买机票的事情泄露了？别人怎么知道我乘你们的航班，而且知道我电话号码等各种信

息，谁泄露出去的？他就告去航空公司和“去哪儿网”。法院经过了二审，支持了庞先生某的主张。

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神秘，其实它从古到今一直都有，我给大家说几个事情。我说孔子，我说论语，秦始皇，司马迁的《史记》，在座的人都知道，其实这都是信息。在以前，没有互联网，这些信息存在哪里呢？存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自然人的脑袋都是一个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价值，为什么没有价值呢？我们只能口口相传，或者有文字的话，构成著作的话，它就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如果涉及到隐私，大不了你不能说名和姓，处过几个女朋友等等作为隐私来保护。至于其他的，你有几个朋友，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脑子里的这些信息，其他人摘不下来，不能把我脑袋里的信息挖下来，所以没有办法整理，没有办法使用。电视里有口口相传的节目，信息传到第三个人、第五个人，可能就走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靠自然人的脑袋来传播的信息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现在的个人信息这么重要呢？互联网时



代再来看信息，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都在网上购过物，都有智能手机，你只要浏览过网页，你的信息在网上就会留痕，这些网络平台可以把数据收集整理之后去卖，有它的价值。所以说现在的个人信息和古代不一样，它可以有无限的拷贝复制性。我给大家读一个最新的法律对个人信息的界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第4条：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特别强调“电子”，而且在网上可以识别出来哪一个就是彭教授的。现在的个人信息主要是在互联网络虚拟空间来讨论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现在个人信息靠什么识别，它的特征是什么？最大的一个特性是个人信息可以复制，很多人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它与知识产权不一样，不需要有独创性。这种信息从一开始就附着于人，具有人格权益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财产属性。如果没有财产损失，谁也不会关注它。在法律上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在互联网空间里面到底归谁？原来我们的信息都记在脑袋里，但是在互联网的社

会，它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你的信息记录在人家的平台上，买东西的话可能留在京东，用微信的话是留在腾讯。特斯拉的汽车也是一样，你的信息留在特斯拉工厂，对吧？这个信息就和自然人发生了分离。我们自己的脑袋仍然有我们的信息，人家的平台上也有我们的信息，这个东西到底归谁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如果要确定归属的话，首先在法律上要清楚，个人信息在法律上的属性是什么，到底是人格权益，还是财产权利？在我们的民法典中，是把个人信息放到“人格权编”第六章，题目是“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只不过我们的民法典没有说是“个人信息权”，我们用的是“权益”，权利和利益。没有用权利这个词，是不是就不是权利了？其实在法律上也不能这么说。成文法再完善，也不可能把所有该保护的都保护了。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比如我们民法典，这次增加了居住权，难道原来就不保护了吗？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有贞操权，大陆的民法典现在还没有，贞操利益就不保护了吗？不是这样的。个人信息也是这样，尽管没有用“权利”这个词，用了“益”，

利益的益，法律也会保护。

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是什么？到底是人格权益，像我们的隐私、姓名、名声、肖像、健康等，还是一种财产权益？我想在座的一些朋友可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可能不是很了解这样的基本原理。在我们的法律当中，如果一个利益是人格权益，是不能转让的，是不能流通的。道理非常简单，比如说，隐私能让它流通吗？身体健康能让它流通吗？能交易吗？我的心脏可以卖掉吗？所以人格权益是不能进行交易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民法典恰恰又把个人信息放在人格权编，这让很多的企业都非常担心。还有，在法理上，所有的学说基本上都把个人信息理解为人格权益，像我们的姓名、隐私一样。这里就发生一个和现实生活的背离，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一些企业基本都是数据性企业，比如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甚至华为、拼多多，都在记录个人信息，我们的信息他们已经都在使用了，我们作为学者也不能掩耳盗铃。

怎么来解决这一对矛盾？你把个人信息界定为人格权益，但是这种人格权益又在流通着，被转让

着。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格权益和隐私这种绝对的人格权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互联网中的个人信息，从一开始就天然包含财产属性，没有财产属性的话，谁都不会关心这个东西。但是这种财产属性是包含在人格利益中的。怎么把这种人格利益独立出来，让它转让，这就是我们法律人要解决的问题。个人信息人格权益是一种法律界定，但是它天然包含着财产权益的属性，这是第二个。

我们法律上把它界定为人格权益了。但是我要说，这种人格权益中包含着具体的财产价值，这个财产价值怎么来凸显出来呢？这就是下面我要给大家演示的。怎么样利用人格权益中的财产属性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一点。两大法系，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人格权益并不是绝对不能用。比如在美国，尤其像名人的肖像，五六十年代时，一些影星同意好莱坞使用自己的肖像，但是要付钱，比如用一次付10万美元或1千万美元。肖像权本身是一个人格权，这种人格权也可以被企业来使用，被好莱坞来使用，可以换成产品价值，这

种权益叫什么呢？在美国叫公开化权。德国也是一样，这种权益叫商品化权。其实在我们国家，这种人格权益也已经在使用了，比如很多开车导引我们的地图提示音，有的是林志玲的，有的是郭德纲的，声音也可以利用。姓名，比如乔丹的姓名也可以被使用。所有这些，尽管是一个人的权益，但是可以商品化或公开化，公开化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财产价值了。企业真正能够使用的是什么呢？是财产价值。在法理上。我们要说明从人格权益怎么能够转化成财产利益。人格权益和财产利益本身是不可相通的，但是实践上又必须要相通。所以在法律实践中，美国也好，德国也好，我们国家也好，创造这种所谓的公开化权或商品化权，企业可以用，用的只不过是财产价值，在理论上能说的通，在实践中也能说的通。但是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怎样能把人的人格权益变成财产权益。我想个人信息从人格权益到财产利益的这个转化途径和机理，在法理上还需要好好论证。

下面我和大家交流一下，为什么信息利用不能突破隐私底线。在此之前我们要先谈一个问题，也

是我们现在正困惑的问题，即个人信息的实践问题，也称之为隐私保护与数据利用的一个矛盾。当然，我提到的隐私权是美国的观念，它指的是大隐私。什么算大隐私呢？就是所有的信息都包含到隐私当中。美国对隐私的观念和我们国家的观念不完全一样。我们国家的隐私权观念是小隐私的观念，即不愿为人所知的一类信息，这与美国不同。在我们国家会遇到这样一个矛盾：我们强调个人信息保护，是站在你和我角度，一定不能泄露我们的隐私，不能泄露我们的信息，不能滥用我们的信息。而数据企业必须使用个体的信息、数据。我们总听到一句话：在互联网社会，数据和信息这两个观念是可以替换使用的。但追根究底，两个观念其实是有区别的，但今天不讲理论。信息被比喻成互联网社会或数字经济的土壤也好，氧气也好，总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数据企业要利用我们的信息，要利用我们的数据。而且大家要清楚，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方方面面，你网上购不购物，用不用智能产品，用不用智能手机？你只要使用过，信息就留下来了。我们基本上就没有隐私

了。在这个数据的土壤中，结出来的果实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这些智能产品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因此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但是其中的矛盾是永远不可克服的，智能产品所获取的数据越广泛、越开放，它的智能化程度也越高。我们作为一个个体，要保护我们的隐私，使用得越少，我们的隐私保护得越紧密，对我们来讲更安全。当然这也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像与国防相关的信息，还有一些与医学相关的，这些领域不能随便开放。

这是个矛盾，它的问题点在哪里？为什么信息利用不能突破隐私底线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答案，我给大家说这么几点，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第一，个体不是封闭的，也不是落伍的，更不是倒退的，人类谁都不能开历史的倒车。数字社会、信息社会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它影响我们的生活，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便捷，甚至给我们国家创造了荣耀、巨大的财富。有时候我开玩笑，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太了不起了，尤其岁数大的人更能体会到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有多快，人民生活改善了多

少，这是纵向来看的。如果横向的看，美国全方位打压我们，针对性地打击华为、腾讯，为什么不打击足球，尤其是我国男子足球？因为即使我们的对手是关岛、马尔代夫，我们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一个东西很笨、很弱的时候，没有谁愿意对其打压，因为不值得。美国打压我们的企业，就是因为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中，这些大企业为我们国家争得了无限的荣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济上的助力。这些企业，恰恰都是数字企业。所以说，如何保护这些企业，保护企业很好地利用数据，我认为无论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是社会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上层，都应该认真考虑，尤其我们企业界。

第二，数据如何开放。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数据库都是一个壁垒，一个孤岛，不要说教育、交通、行政不同行业，就是一个大学里不同的院系，个人信息都是封闭的。因此，我们现在把数据开放，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再怎么强调数据企业的发展，再怎么强调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我们个人的隐私信息保护这一底线都不能被突破。为什么不能突破呢？我们国家为实现经济发

展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惨重的代价我认为大家也都感同身受，我们破坏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了地球上最严重的雾霾。这种雾霾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追求快速的经济的发展，破坏了三江源，破坏了长江，破坏戈壁的很多生态。但是，我们现在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事后补救，怎么补救呢？颁布环境保护法，不断丰富法律条文，去年中央还专门为长江立了一个法，现在我们的环境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大家想一想，隐私信息方面的问题能补救吗？在法律上，能补救吗？以法律的条文进行补救，那是不得已的救济，这种救济是无能为力的，实际上是救济不了的。

我举个例子，什么叫隐私。假设我彭诚信是一个同性恋，这个信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因为这对我来说是隐私。但我的一个男蜜，女生叫闺蜜，男生叫男蜜，就是一个好朋友。他无意也好，有意也罢，就认为是有意吧，在一个派对上把这个秘密说了出来。因此，他构成了侵权。他可以道歉，也要赔偿损失，法院判定他赔偿 50 万。他是一个大教

授，也支付得起这样的赔偿。我想请问大家，我的隐私受到保护了吗？地球人都知道我是个同性恋了，对不对？甚至我的朋友说，彭教授我给你道歉，尽管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侵犯你隐私了，我赔你 50 万。这不是又一次伤害我吗？我本身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是一个同性恋，但是你还给我道歉，还说这句话，尽管说的是实话。是啊，隐私就是事实啊，我只不过不想让别人知道，结果你给我泄露出去了。隐私，是隐私性信息，在法律上不能得到终极救济，只要泄露了，那就是泄露了，无从救济。

所以，这个底线不能被突破。涉及到隐私的这种信息有哪些，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第一，我们的性取向。第二，我们生理上的隐私。第三，我们的宗教信仰。第四，我们的政治观念。还有诸如银行信息，金融信息等内容。在民法典中，我们用了好几个概念，隐私信息或私密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用了敏感信息、非敏感信息等。无论用了什么描述词汇，这些隐私性的信息都有关一个人在地球上能不能好好生存。所以，对隐私性信息的保护是不能

被突破的，因为它不像环境、地貌一样，还可能进行补救，隐私信息一旦泄露是无可救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强调个人信息的利用，无论怎么强调它对这个社会经济的重大意义，都不能突破隐私的底线，理论上就是这样。

隐私性信息不能突破底线，小则涉及到我们的个人安全，例如我们的金融账号、机密信息等，大则涉及到国家安全。信息的保护法律和其他的保护法不太一样，为什么不太一样？例如民商法，其主体之间的法律，刑法、经济法、税法是纵向管制的。信息安全保护法涉及到各个学科的交叉，各个法律的交叉，既涉及到民商法，也涉及到行政监管，因为信息涉及到个人安全、国家安全，监管就要立法。信息领域的问题还涉及到出境入境，它不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法律管得了的。例如特斯拉，它收集到我们的信息，有可能很快传到美国的平台上，信息有可能是出境的。信息有时候又是入境的，所以说信息的保护又涉及到国际法，不同国家之间的法，所以比较复杂。像这种隐私性信息的侵害，有可能涉及到安全系数极高的内容，而且传

播速度极其快，范围也十分广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尤其是个人的信息，国家安全的消息，是不应该被泄露的，一旦被泄露便无可救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利用也不能突破隐私底线。

最后一点，信息安全底线不能被突破，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以特斯拉为例，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开特斯拉的，如果你现在买特斯拉汽车，要么你对这个社会的信赖程度极其高，或者你可能对个人的信息不是那么在意。什么意思呢？特斯拉车主一进入车内，它的传感器能感受到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声音，你说的所有的话，都将被录下来的，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但是这些内容都能被调用出来。其实如果我们用智能扫地机、智能冰箱、智能空调之类的智能家电，一切都是智能的话，它们能把你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睡觉等行为习惯把握得十分精准，我们还有什么隐私可言，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古代的人用树叶遮住隐私部位。今天我们处于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都不关心隐私的话，我们在另一个维度将又变成裸体，只不过这种裸体是什么呢？是信息的，我们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什么私密都暴露无遗。人类几千年的努力，在现代社会才构筑起的这些脸面，我们还要不要？比如穿衣服是社会一致的素质底线，这些还要不要？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的体面还需要保护底线的话，我们的隐私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不能重新洗牌，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我们怎么强调数字经济，都不能突破隐私底线。

最后一个问题，个人信息怎么保护。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个人信息它需要各类法律的保护。我是民法学者，今天我主要从民法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怎么理解个人信息的属性，怎么来利用，怎么来保护，我谈的都是民法，以及侵权怎么来救济。其实个人信息的保护要靠立体的多元的法律来保护，除了民法，刑法也要有。我国的反垄断法现在建立起来了，很多案例涉及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还要靠行政监管，要靠国际化公约，只有靠这些法律、公约的配合，才能把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好。

最后我总结一下。首先，个人信息在使用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它是未来整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方向，即智能化产品。第二，无论怎么强调对个人信

息的利用，都不能突破隐私底线。第三，怎么样才能确保使用信息时不突破隐私底线呢？要靠我们技术上的加密，所以互联网中密码学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个企业都使用密码，所收集的数据隐私都要保护好。更重要的是未来真正对我们的隐私保护起到重要作用的工具——制度密码，什么叫制度密码？就是法律，一定要在制度上严格地控制所有的企业，包括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已经掌握的信息不能轻易泄露出去，不能轻易解密。例如我们国家这次疫情中使用的健康码，涉及到我们千千万万人的信息，我们到哪里都要健康码。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隐私呢？我们 14 亿人口的信息已经完全被搜集了。如果这种东西被第三方解密了，被泄露了，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冲击。怎么来保护信息安全？必须要靠法律，要靠法制，而且这个法制不仅是一国的国内法，信息时刻出境入境，还要靠国际法，靠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齐心协力配合保护好我们信息，我们的数字企业最后才会健康发展，否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潜在的危害。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希望有缘我们在线下再相会，谢

谢大家，谢谢乔秘书长。

乔依德：彭教授，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听众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一下。

彭诚信：好啊，欢迎。

乔依德：我看到有些听众的一些问题。他说，个人信息不一定有财产属性，比如说自己使用自己的信息，这是不是财产权益？我自己个人所控制的算不算财产权益？

彭诚信：我回答一下。如果你个人使用，不进行交易的话，你定性为财产价值或人格权益，都没有任何意义，不需要讨论。为什么呢？当我们讨论财产价值的时候，一定要谈到交易，在交换的时候才有价值。任何东西不存在交易的时候，它就没有价值。你说它有价值，也没有意义。比如说银河系，你说它有没有价值？上面可能什么都有，黄金什么都有，但是它没有交易，我们也得不到它。我谈的这个价值，是法律上的价值，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在法律上我认为，个人对自己信息的利用，主要强调还是人格价值，人格价值是消极的。什么叫消极的呢？我的健康，我的姓名，你不能侵害，我

自己可以使用，这是我的人格。它们的财产价值有没有呢？如果在互联网络社会，这种价值天然就有。如果你自己利用的话，它不显露出来，被你的人格利益吸收了。交易的时候，财产性价值才能展现出来。而且只要交易，必然产生财产价值，你怎么解读是另外一回事。总之，人格利益是不能交易的。

乔依德：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彭教授你怎么看待餐馆扫码点菜这个程序，你点菜必须先关注商家的公众号，这算不算是对于隐私的一种侵犯呢？

彭诚信：这个确实侵犯了我们的信息权，它收集我们各式各样的信息，它让你输入什么信息，你的信息就泄露出去了，包括头像等等。它表面上是问我们同意不同意，好像征求我们的意见了，实际上是它强迫你同意，我们不同意其实就没有办法使用，对吧？它问你同意没同意，已经是很好的了。有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只要你一点，人家就把你的信息头像收集完了，这样是更恐怖的。

这位先生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涉及整个法律事务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同意授权，这个规则到

底怎么来建构。尽管我们法律上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敏感信息必须要一对一的同意。你要问到彭诚信，同意不同意我用你的身份证号，同意不同意我用你的地理位置，这个才叫同意。像一般的信息，性别等这些信息，就漠视。你进入京东，进入腾讯，人家都有一个标准合同，你同意不同意，你一点同意，那就同意了，不需要针对你彭诚信单独同意。表面上好像是解决了题，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在座的朋友你琢磨琢磨，到今天为止，你要上网，你要上那个京东，你不同意能行吗？没有办法的，你用不了啊。其实我们是被强迫的。

今天我没有展开谈，其实这里面还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私密信息我当然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为什么老百姓现在这么关心数据信息同意规则？我前面讲的隐私与安全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分财产，想分利益。为什么呢？数据企用我们的信息得利了，我们是这个信息的提供者，我们没有得到好处啊，反而有时候你还害我们。乔秘书长你买机票，可能和我买机票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虽然

登陆的是同样一个平台，对吧？就是说，他了解你经常去哪里，他可能给你定一个价，这个价可能比我高。数据平台用我的信息，本来没有给我付费，现在你不但没有给我好处，有时候还坑我，给我推销垃圾广告等等。

现在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了，怎么能制定出切合互联网络社会的一种真正的规则。什么是真正的规则？不要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同意，也不要这种强迫式的同意，怎么能让数据企业好好使用，不能滥用，不能过度使用，不能过度收集，又保护我们信息主体的隐私安全、信息安全，而且还能让我们得利。只要找到这样一种规则，我们就赢了。现在呢，这个问题我解答不了，你的信息肯定是被他们收集了，而且被他们过度收集了，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但这是现在社会中的一种常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法律，企业，各个行业，包括每个自然人，都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乔依德：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我倒有一个问题，我也请教彭教授。回到特斯拉这个所谓的维权事

件，我们现在不谈它到底怎么样，特斯拉有没有错等等。我就对它公布数据的权利提一个问题。特斯拉有没有权力？或者说它把撞车前一段时间的数据信息公布出来，没有得到车主的同意，它可以不可以这样公布出来？是不是违反了什么法律，或者是不是侵犯了车主的权益？

彭诚信：乔秘书长，你问的问题特别好，特别有法律人的感觉。这个问题好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我也解答不了，但是我要把这个问题的本质给大家说出来。困惑全世界最难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我们讨论个人信息要在平台上，要在互联网社会中来讨论。我们的信息会落在京东上，落在腾讯上，落在字节跳动上。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这位车主的信息会落在特斯拉公司的平台上，这个平台上的信息到底归谁？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到现在谁也解决不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回答。你的姓名、性别、开车的里程、在车里说的话、踩刹车、整个驾驶的动作等等，信息是归平台，还是归你，还是归平台和你长共有？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归谁就由谁控制，但是这个解决不了。还有，如果特斯拉把你

的信息又卖给了京东、字节跳动，同样都是你的信息，谁拥有？这都是一个难题。谁拥有，谁才有权利来控制，来支配，来公布，对不对？现在法律上没有解决。在理论上，其实我倒能给你解答，但是地球上的人不一定听我的。什么意思呢？其实一涉及利用的时候，你的这个信息，当你允许了特斯拉使用的时候，他用的只是你的财产价值，但是这个财产价值天然地包含你的姓名、职务，否则就不叫个人信息了。正因为特斯拉拥有你的数据信息，仍然能识别出来是你，所以在人格利益的层面你永远都支配着它，因为这是你的信息，而且这是人格利益属性。财产利益属性呢，卖给特斯拉，是取决于你和特斯拉之间的合同，反正这种合同都是标准合同。问题在哪里呢？当特斯拉公布这一分多钟的数据，这个数据表征开车车主的行为、车主的性别、车主的年龄等各种信息。这种信息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财产属性，它既有财产，上面又有车主的人格信息，谁能公布啊？至少现在来看的话，通过双方合意才能公布，一方不能轻易地来公布的。这是我初步的感觉。因为人格信息和财产信息是分不清

的。还有，当这里涉及私密信息的时候，双方企业都没有权利。而且这里可能涉及由工厂来介入，工厂通过行政程序等来决定是不是要公布。所以它非常复杂，简单地来说，我觉得非常难。我举个例子，车里面发生了突发事件，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涉及这样信息的话，谁来公布？即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可能都不能轻易公布，这里面的信息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涉及间谍行动。所以，我认为信息的公布，它这个权限要综合考虑到很多方面。问题的根源是界定在平台上的这种数据到底应该归谁，谁享有控制权，谁享有支配权。

乔依德：谢谢彭教授。因为车主认为特斯拉侵犯其隐私权，这个案子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以后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我们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彭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对我们提出问题的回答，也谢谢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沙龙。今天沙龙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

蔡昉

人口问题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上海发展沙龙第 166 期 2021 年 6 月 8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的沙龙，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地邀请了我国著名的人口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先生，给我们做关于老龄化一个演讲。大家也知道，不久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发布了关于生育政策的一个调整。再前不久，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也公布了。整个社会对于我们现在当前的人口少子化或者老龄化比较关注。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蔡院长，跟我们讲一下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以及应对的策略。现在我们就请蔡院长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谢谢乔秘书长，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因为这几天正在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我不能跟大家在线下见面。好在过去一年应对疫情期间，我们也习惯了在线上开会，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我们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这也是我一直在关心和研究的内容。正像刚才乔秘书长讲到的，我们最近两个重要的信号，一个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发布，再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了放开“三孩”。大家也切身体会到人口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所以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思考和一些研究的结果。

首先我们看看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有哪些新的信息。我认为普查的信息没有改变我们过去的判断，总人口达到 14.1 亿，大体上和我们原来想的没有显著的增加，比六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 7087 万人，但是增加的人数显然不能作为 2020 年在 2019 年基础上增长的，要分摊在过去的 10 年中。2020 年是质量最高的一次人口普查，应

该把多出来的人口平滑到至少 10 年的时间里，这意味着总人口的增长更慢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总人口增长越来越慢，第二，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用 65 岁及以上人口作为老龄人口的标准，2020 年达到了 1.9 亿，占比是 13.5%，比发达国家低 5.9 个百分点，比其他欠发达国家高 7.5 百分点，高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要比和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也充分显示了我们未富先老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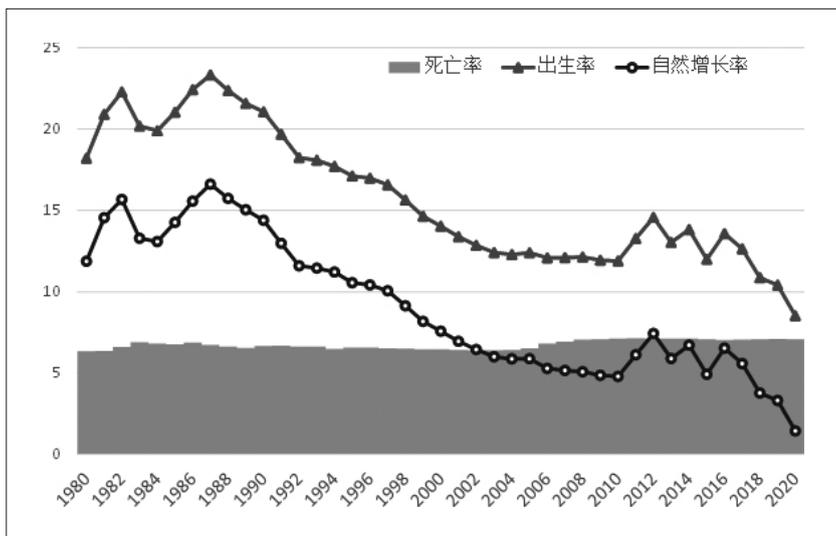


图 1：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

我们再看看这个趋势。人口增长其实就是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机械增长，比如说迁移，从国外

移进来，或者从外地移进来，作为国家，我们移民没有开放，所以我们不考虑机械人口的增长。我们只看自然增长，自然人口增长就是出生率减死亡率。死亡率在过去几十年里是非常稳定的，由于我们老龄化程度提高，死亡率会略有提高，但是幅度很小，大体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出生是直接相关的，出生率减去比较稳定的死亡率就是自然的增长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趋势是完全一样的，中间就是差了一个死亡率。

因为刚刚普查完，我们把增长分摊到了过去十年里面，很显然过去十年比 2010 年之前都高了一块。如果分摊的时间更长，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行就更加地一致，持续下行更加平滑。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十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降得非常快。除了 2004 年、2006 年，一次是单独二孩的政策，一次是全面二孩的政策，有一点非常小的反弹，而且只持续一年，随后都是持续下降的。2020 年和 2019 年都是新低，这个趋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千分之一点几的人口增长率其实已经

接近于零增长了。



图 2：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如此之低，是这次普查数中最重要的信息。一般地说，总和生育率的含义就是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我们一般认为一个妇女或者一对夫妻生 2.1 个孩子是一个更替水平，从人口数上可以替代父母辈。在这个水平上，比 2.1 高的就是高生育率，比 2.1 低的就是低生育率，如果再低，就是很低的生育率了。大家注意一下历史，2000 年我们进行的是第四次人口普查，当时直接从普查数算的总和生育率是 1.22，相当低。但是当时计划生

育部门认为因为有些孩子会被漏报，因此做了一些“修正”，把这个数据提高了。两次普查中间，在2005年进行了一次小普查，就是1%抽样进行一次普查。这次直接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1.34，也相当的低。但是我们仍然对它进行了“修正”。2010年进行六普，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1.19，更低了，但是我们也进行了“修正”。修正的结果官方并没有公布，但是大体上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总和生育率大约是1.8，后来稍微降了一点。联合国关于中国总和生育率的统计数，大概在1.68、1.69、1.70左右，那其实代表我们官方认可的一个生育水平。但是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1.30，我认为这个数据是没有刻意“修正”的，我猜想也是因为没有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么一个部门去要求修正了。过去这些年，学者一直坚持总和生育率是1.4左右，现在甚至比很多学者估计的还低。我认为这个数应该代表我们目前真实的生育率，一般认为生育水平达到1.3就属于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很容易陷入到生育陷阱，到这个水平以下，回升就非常艰难，这是一个最大的信息。

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要关注人口问题呢？过去我遇到一些朋友，听说我研究人口问题，很多人就会跟我讨论，很多人关心能不能生二孩。现在更多的人对于“二孩”的愿望已经不太强烈了。很多人认为这对中国经济会有影响，很多从事研究或从事财经工作的人都会从现实的工作中看到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人口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古人有一句说法，叫“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过去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比较好的人口年龄结构，如果生产者多，消费而不生产的人少，就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一个好的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把这个叫做人口红利窗口期。现在我把“生之者众”和“食之者寡”，做另一个衍生，“生之者众”还是代表我们曾经有过人口红利的时期，“食之者寡”代表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消费者就不足了，这就到了老龄化深度的时期。

大家从图 3 可以看到，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婴儿潮，婴儿潮意味着 0 到 4 岁孩子的大量出现。20 年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20 岁到 24 岁人口潮出现了，这就是人口的回声，这批人是当

年的孩子长成了劳动力。那么再过 40 年，他们面临着退休，再过 20 年，他们就进入了 80 岁以上的年龄，就逐渐成为高龄老人。我们讲人口的回声效应，其实就是人口红利从有到无的一个过程。因此，理解人口的回声效应有利于认识人口红利的整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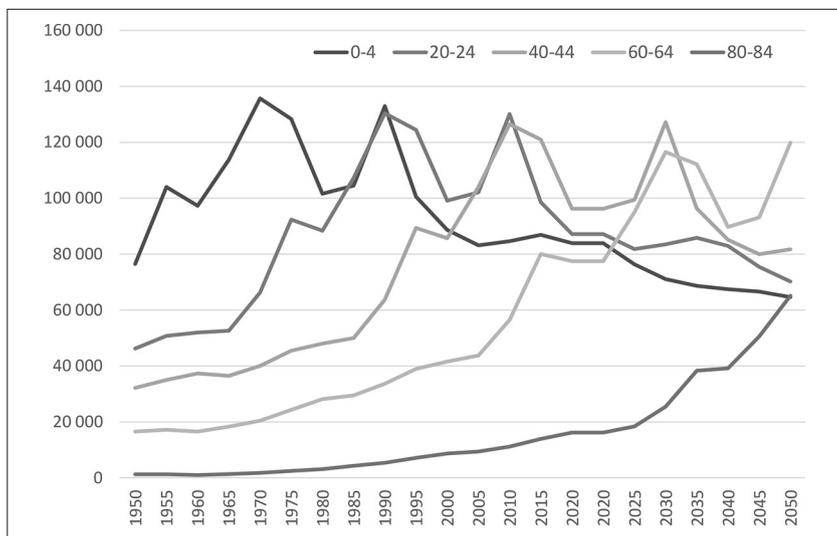


图 3：人口回声效应

在国际上，世界银行会把各个国家按照人均 GDP 分成四个组，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后来他们发现人口转变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标志着有没有人口红利，因此

按照这个标准也做了四个组的划分，分别是人口红利还未出现的前人口红利组、开始显示出人口红利且经济从中受益的早期人口红利组、人口红利存在但是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晚期人口红利组、人口红利消失的后人口红利组。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还是早期人口红利组和晚期人口红利组，即有人口红利就能保证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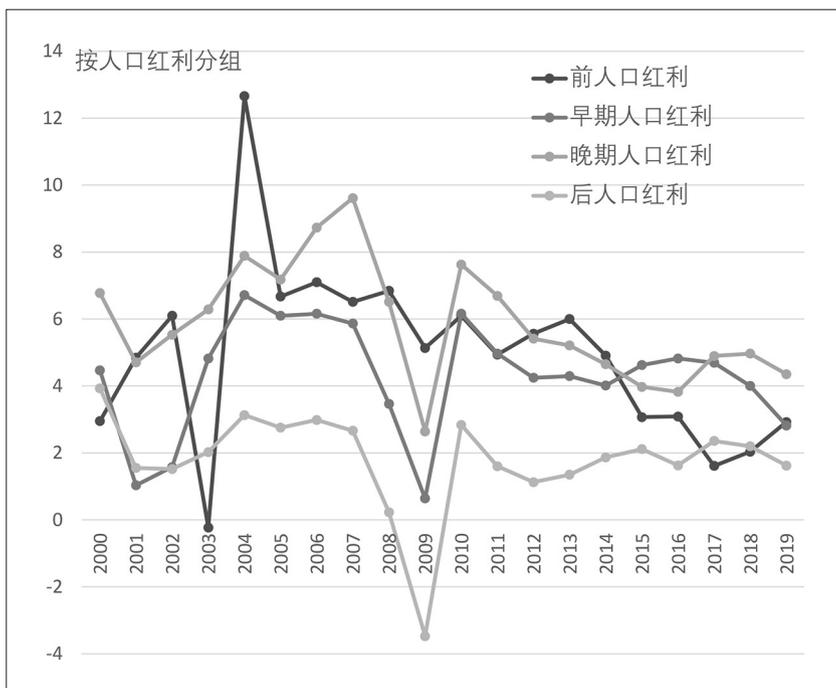


图 4：按人口红利分组的 GDP 增长率

前人口红利组还没有出现红利，后人口红利组的红利消失，这两个组的经济增长是压底的。从图 4 可以看到，在整个世界经济中，都能够显示出这样的趋势。现在一般把中国划分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

我把世界银行这两种分组方式放在一起，按照收入分组或者按人口分组。图 5 可以显示出，世界上高收入组正好对应着后人口红利，其收入水平是一样，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大体上都是处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两者人均收入水平也大体对应。中等偏下收入对应着早期人口红利，低收入就对应着前人口红利阶段，这个也显示出两者之间是相关的。中国是晚期人口红利，同时也是中等偏上收入，但是我们其实面临着一个“未富先老”的挑战，意思是我们老龄化的程度在世界上的排位比我们人均 GDP 的排位要高。我们在还没有跨入高收入门槛的时候，也就是人均 GDP 达到 12535 美元这个坎的时候，我们人口红利的丧失程度更高一些，显示出和高收入组接近的这个后人口红利阶段特征。如果这个特征特别明显，很有可能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就会减得太快，

超出了合理幅度的话，可能会使我们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不能达到。因此，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要避免回归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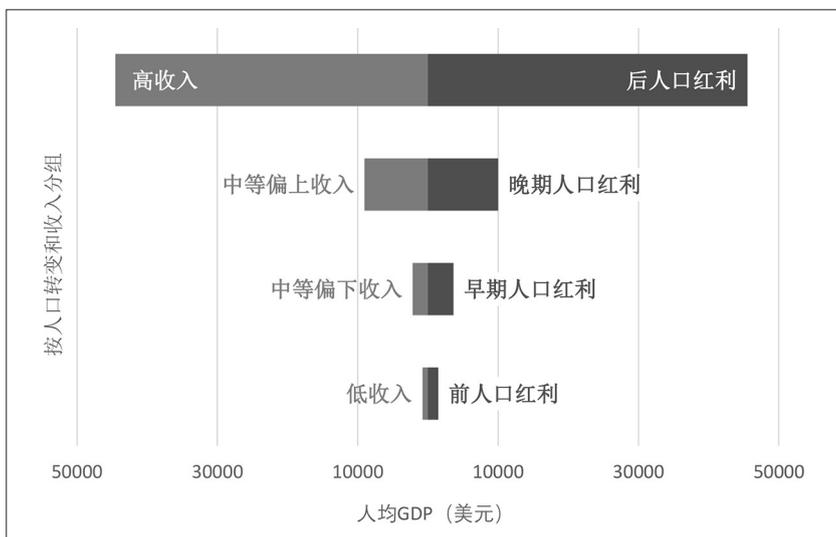


图 5：按人口转变和收入分组的人均 GDP（美元）

什么叫回归均值？这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其实是从别的学科借鉴来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有异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是有特殊原因，比如说中国高速增长 40 年，特殊原因是改革开放，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利用了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过去了以后，可能意味着要回归均值，回归世界的平均水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当过美国财

长，也当过哈佛大学校长，他曾经预测中国经济要回归均值，回到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多少呢？过去 20 年大体上就是 3%。当时他们预测中国 2015 年就回归均值，结果很显然，我们 2015 年实际上还是 5%-6% 的水平。为什么我们不会现在回归均值呢？因为我们的人口红利可能还有一些潜力，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是负增长，但是我们还有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现在农业劳动力的占比大概是 25%，这个比重还是很高的，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平均比重只有 3%，美国、日本只有 1%。发达国家没有劳动力可以转移，但是我们有劳动力可以转移。如果和美国相比，我们还有 24% 的劳动力可以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中国来说，一个百分点就是 800 多万劳动力。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或潜在增长率，长期看是下降的，但是根据我们的预测，真正要回归到世界平均水平，可以延长到 2050 年，在这个之前我们都高于平均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潜力能不能维持，能不能得到发挥，有没有什么因素会干扰我们达到自己的增长潜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人口所

要关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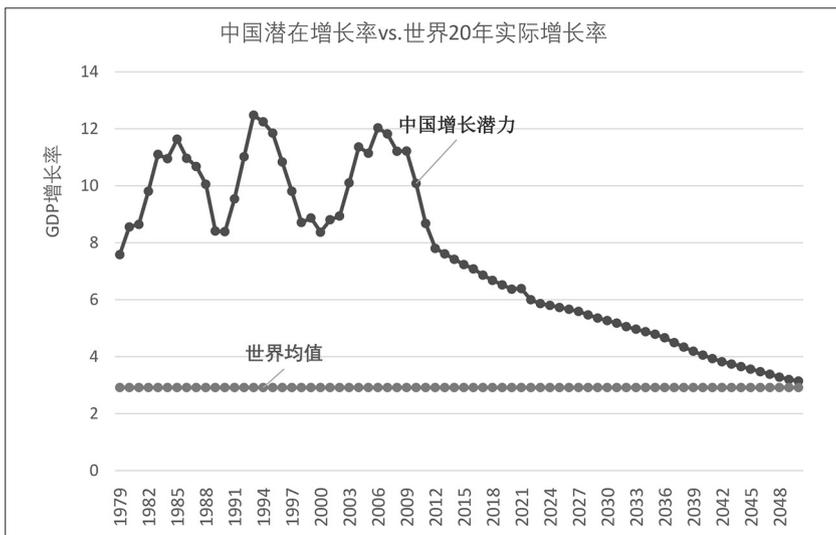


图 6: 中国潜在增长率 vs 世界 20 年实际增长率

从中国的经济来看，我们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会经历两个非常重要的人口转折点，当然其他国家也会经历。我们正好是在这个转的过程中，相应地会遭遇到一些经济冲击。如何应对这些冲击，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能不能实现我们“十四五”，乃至 2035 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两个人口转折点，以及相应的经济冲击。大家从图 7 可以看到中国两

个人口转折点。第一个，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我们把它定义为 15 到 59 岁的人口，已经在 2010 年达到了峰值，在这之后显现出劳动年龄的负增长，从供给侧受到冲击，影响经济增长。2025 年左右会迎来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我们把它叫做总人口的峰值，14 亿多，然后就是负增长。我想 2025 年左右人口达到最高点应该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会提前。一种可能是我们第二个峰值到来以后，会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个是这个峰值会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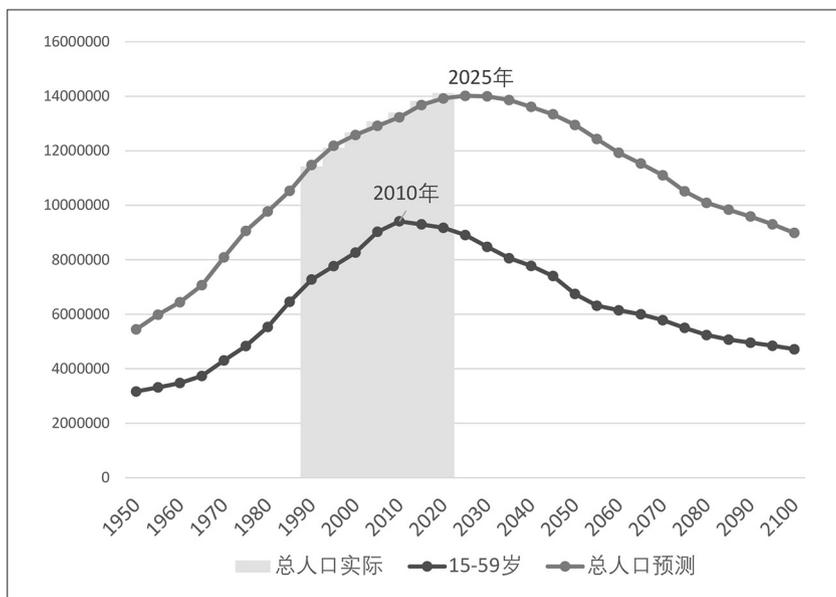


图 7：两个人口转折点

提前，比 2025 年还早。即使没有达到 2025 年这个人口峰值，我们会不会提前遇到需求侧的制约，使这个冲击提前到来，这是另一种可能性。这些都需要我们积极应对，如果应对不好，两种可能性都会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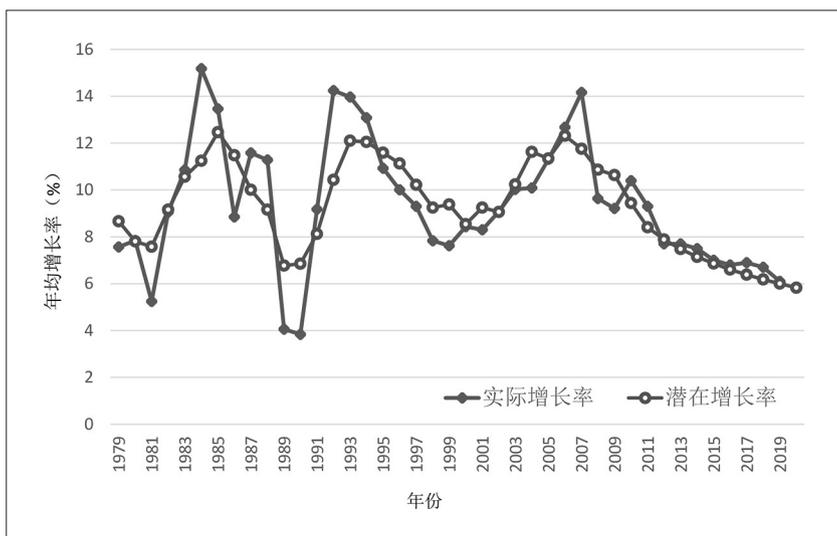


图 8：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

我们先看第一次转折点，简单做一个回顾，第一次人口转折点是 2010 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力短缺，肯定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第一，新增劳动力减少，也意味着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会老化。每

一代新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会高于前人，存量的人力资本还是会改善的，但是新人增量减少了，改善速度就会放慢。第二，劳动力短缺，企业没有办法，就要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替代活人，这时候过度投入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第三，如果没有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资源重新配制提高生产率的机会就会减少。

所有这些因素放入一个生产函数，让经济学家计算，结果自然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了。看图 8 红线，是我们在 2012 年左右预测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大家可以看到，红线和蓝线这条实际增长率是高度吻合的，也就是实际增长率因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下降。我强调两者高度一致，不仅是强调当时的估算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一致？因为潜在增长率得到实现，没有受到需求侧的制约。但是如果第二个转折点来了，需求制约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可能成为影响潜在增长能力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总人口将在 2025 年前后达到峰值，之后人口会影响整个经济增长，可能更多显现在需求

侧。需求侧的因素主要包括出口，投资，消费这三个部分，过去大家都叫三驾马车。我在这里把它叫三套车，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三驾马车有些人理解为是可以拆分开来的三辆马车，我强调三套车指的是三个部分共同组成了一驾马车，这三匹马分别是出口、投资和消费。第一，出口方面。劳动力短缺在未来将会无法避免，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短缺程度也将逐步加剧，工资上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企业成本也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将下降。自 2012 年中国经济减速开始，人口增速便开始下降，这个下降趋势在未来有可能长期持续，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出口，特别是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的压力将逐渐变大。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2006 年达到 36.3% 的本世纪峰值，从那以后便迅速下降，目前只有 27%，可以说供给侧冲击转化成了需求侧冲击，也影响出口。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冲击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比较优势也弱了，这导致企业投资依然乏力。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是派生的，实体经济发展快，则基础设施投资

意愿也走强，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会减弱。全球的投资增长率在 2010 年之后都是下降的，下降幅度也很大。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能继续过分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本的投入来支撑经济的增长。中国长期以来都存在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也高于高收入国家，甚至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也意味着中国过去对投资拉动经济过分依赖。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角度来说，我们未来投资不能再像从前一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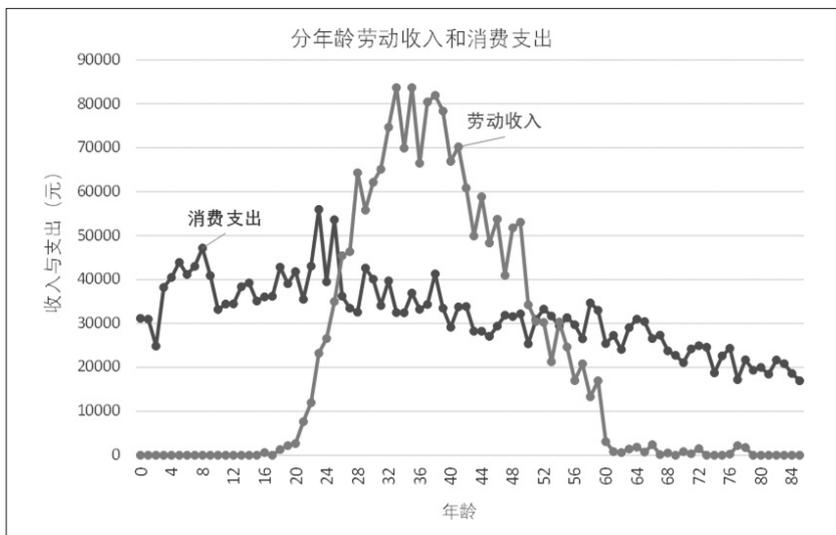


图 9：分年龄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

最后，我们只能更多地依靠消费需求，但是老龄化是的民众对金融服务业的消费需求是下降的。我们做了劳动力市场调研，所的结果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变化，劳动收入情况和消费支出情况。劳动收入高度集中在 20 岁到 60 岁之间，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以及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劳动者是没有劳动收入的。劳动收入在 30 岁到 40 岁之间达到最高点。与收入不同，消费是终身的。人口就是消费者的总和，因此人口增长快，消费增长也会快，反之亦然。若人口负增长，其他条件无变化，消费可能负增长。

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也会影响消费。劳动收入这条线，把消费支出这条线分成了三段，分别是青少年的消费，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以及老年人的消费。这三段消费都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中国人口的消费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是比较高的，也就意味着这部分由于新生儿越来越少，有一个由稀缺所引发的规律，即家里普遍愿意为孩子多花钱，社会、市场也会利用这种心理提高孩子的消费水平。因此，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或者刚刚进入劳动

力市场这段时间，消费者的消费非常高。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获得收入的劳动者的消费并不高，反而相比之前有所下降，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现收现付悖论。第一，他们要缴纳各种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这个比例是很高的，无论是他们自己缴的，还是单位出的，总之都影响他们的收入，进而也会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但是我们交的养老保险，并不是原地积累在账户中，而是当时就支付给已经退休的人，所以这个体制叫现收现付制，这就意味着获得收入的劳动者要承担这个负担。为什么叫悖论呢？我们知道，等到现在的劳动者退休的时候，人口的结构、抚养比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养活更多的老年人。因此，那个时候可能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就没办法维持了。因此我们今天不仅要缴纳养老保险，同时还要为自己未雨绸缪，进行预防性的储蓄。虽然劳动者挣钱了，但是并没有充分消费，有后顾之忧是问题的关键。到了老龄化阶段，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逐渐减弱，因为养老保险水平肯定没有工资水平高，还有一些覆盖不到位的。有一些人参加的

是城乡养老保险，给付水平很低，因此消费力不高。除此之外，老年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也不高，且自身也有后顾之忧，他们为孩子着想，为孙辈着想，因此他们也想省钱。所以老龄化程度越高，消费需求、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会下降。综上所述，这三套车的三个动力源都有弱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当我们人口转折的第二个转折点到来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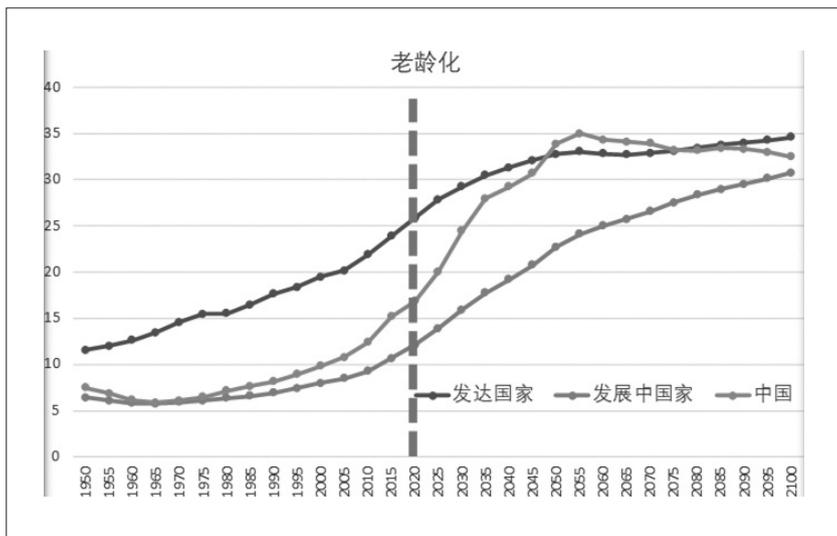


图 10：老龄化情况

那么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之前已经经历过类似情况的国家有什么前车之鉴。如图 10 所示，蓝色那条线是发达国

家，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了，灰色这条线是中国，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大概几十年以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会超过现在的发达国家。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问题也在加剧，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快。迄今为止，我们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还有差距，这个差距也给了我们一个时间窗口。我们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叫先富先老，他们已经处在高收入水平了，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为人均 GDP4 万多美元。中国老龄化程度没有发达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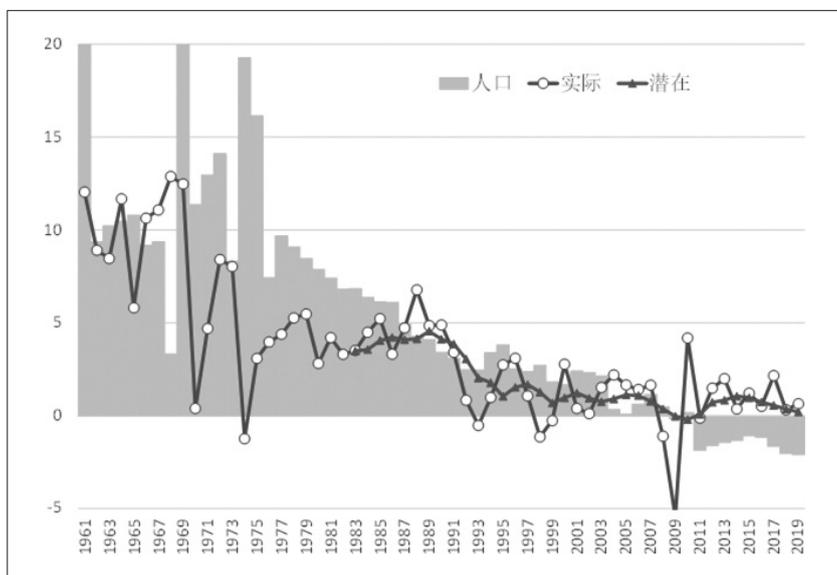


图 11：日本：失去的人口与“失去的三十年”

那么高，但是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叫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的特点就意味着我们要应对中国国情下老龄化所带来的特殊挑战，即未富先老。

从一般规律来看，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大家都说日本失去的 10 年，失去的 20 年，现在已经失去了 30 年。我要说，它失去的 30 年和失去的人口是密切相关的。如图 11 所示，它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大幅度下降，相应的潜在增长率也显著下降，实际增长率也跟着下降。1960 年日本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经济增速开始减慢。到 1990 年代初，日本跨越了人口的第一个转折点，随后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进一步下滑。2009 年，日本的人口进入到第二个转折点，总人口出现负增长。随后日本经济增速、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实际增长率进一步大幅度负增长。如今日本遭遇到了供给侧的冲击，也遭遇了需求侧的冲击，它现在的潜在增长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而且实际增长率经常达不到潜在增长率，出现了负增长缺口，日本成为了一个经济长期停滞的

代表。其他发达国家也慢慢走向了长期停滞。外界把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现象叫做“日本化”。

2019年9月，萨默斯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美国距离日本，或者距离长期停滞，只差一次严重的衰退。几个月后新冠肺炎冲击带来了这次严重的衰退。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一直在跌，现在已经基本上接近于零了。长期停滞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我们用“三低两高”来刻画它。第一是低通货膨胀率，或者干脆叫通缩；第二是低长期利率，也可以说过度储蓄，储蓄率大于投资率，过多节省资金，利率不可能提高；这些因素导致了第三低，即经济增速低，由于潜在增长能力不高，同时还有需求侧的制约。还有两个特征，一个是高龄化，另一个是高负债。当然高负债和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与发达国家的新常态和人口老龄化是密切相关的。

对我们来说，防止未富先老，这一目标可能已经很难达成了，我国老龄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我们要避免未富先滞，不要陷入发达国家的停滞

状态，不要陷入低通胀、低增长、高负债这样的状态。当年日本是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 GDP 总量还很低，人均水平也很低。当时一度认为日本赶超速度很快，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但是 90 年代前期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后，便陷入了长期停滞，从 90 年代到现在近乎是零增长，即使是在经济实现增长的时段，增长速度很少能够超过 1。因此，日本和美国的距离越来越大，日本超越美国永远不可能发生。我们 2010 年超过日本，超越之后距离迅速拉大。我们在第一次人口转折点，即 2010 年之后，经济增长还保持了较快的速度，因此我们和美国的差距继续缩小。这次新冠肺炎，我们是全球罕见的正增长的经济体，而美国是负增长，我们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在 2025 年十四五结束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能不能在 2030 年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重要的挑战。

我做了这个分析之后意识到，要从供需两侧研究我们的政策应该有哪些着力点。第一，大家关心的生育率还有没有可能提高？我们放开三孩以后，

很多人说二孩都不生，三孩怎么生？总的来说，中国的生育水平不可能回到 2.1 这个更替水平，但是能够向它靠近，比如 1.8，那就是很好了。而且只要有靠近的趋势，多少都是有益的，都是影响未来的。

联合国统计了各国的实际生育率水平，部分国家仍旧保持了很高的增长率，非洲有的国家一个家庭拥有六七个孩子。当然，也有很多国家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只有 1 的水平，还有几个低于 1 的国家，差距非常大。联合国也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到生育率低下的国家去询问，生多少孩子最合适？回答往往是两个最合适。在生育率很高的国家，回答也是两个孩子最合适。也就是说，两个孩子这个更替水平，是人类的意愿。

影响人意愿的原因有很多种，但人口增速的持续下降是不可逆的。最近柳叶刀上有一篇文章说，生育率下降近 80% 的原因可以用两个理由解释，一个是妇女受教育程度，另一个是避孕手段的可获得性，这两个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不可逆的。但是，也有很多不想生孩子或者只生一个的，他们

会非常明确说，自己养不起孩子。因此，从低于 2.1 向 2.1 靠近，取决于社会福利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中国，我们把它概括为三育成本：生育、养育、教育。我认为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放开三孩的政策决定，是和配套支持措施并列的，因此我们下一步要做是必须使配套支持措施跟上，让三胎政策变成实实在在的有真金白银支撑的政策。

我们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说有也行，说没有也行，但过去那种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很充足的可能性是没有了。因此，我们必须解决经济增长本身的问题。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提高生产率。当我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人口红利走向枯竭，企业经营困难的时候，我们采取比较多的办法，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企业寻求保护，企业对地方 GDP 贡献很大，对财政税收、就业也有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倾向于给企业做担保，帮助其继续融资。这在过去也发生过，日本的银行制度也曾导致政府支持很多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第二是企业得到了更多的资金以后，就有

充足的能力去实现机器替代劳动力，能够制造一个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面效果。这样的政策虽然支撑了一定的增长，但是没能实现优胜劣汰，生产率高的、竞争力强的企业，和生产率低、竞争力不强的企业，并存在市场。生产力不断进步的表现之一是生产资料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转移，这样的资源配置才能使得经济达到更高的水平。那些竞争力低的企业也留在市场上，该死的不能死，该退的不能退，就意味着生产率总体的下降，我们叫资源配置的僵化。

我们制造业就业比重这些年是下降的，但是固定资产的投资还在提高，这意味着增加值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深化达到的，而不是靠生产率提高，当然也不排除生产力提高的现实可能，但是总体上看生产力提高并不突出。

资源配置的僵化，还会出现一种资源配置的退化现象。我们制造业比重在下降，农业的劳动力数量长期在下降，这符合经济规律。但是，最近几年中，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也是减少的，同时第三

产业的劳动力数量大幅度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农产业低，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但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低于第二产业，可能会让大家有些惊讶。第二产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意味着从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了低生产率的部门，这是一种劳动力的逆向配置，是违背产业结构调整规律的，这个规律我们把它叫库兹涅茨过程。因为库兹涅茨认为，产业结构的变迁就是跟随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方向。但是现实情况是，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逆的配制，因此我们把它叫做资源配置的退化，这也是我们生产力不能得到提高的重要原因。

生产率提高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其实我们应该反过头来，如果你的信号正确的话，企业知道如何提高配置，这取决于信号。政府应该做什么呢？政府不要教企业如何提高生产率，也不完全是靠发展新兴产业，这些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允许优胜劣汰，优的胜出了，劣的退出了，生产率就会得到提高。首先，我们需要稳定住我们的制造业比重。从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谈不到

什么明显的规律，但是总体上来说，制造业比重是逐渐提高的，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以后，制造业比重才逐渐有所下降。

因此，我们产业政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稳定制造业的比重。我们要破除制造业发展本身就能够改善分配的迷信，破除涓流经济学，让产业发展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这里头就需要更充分的竞争，优胜劣汰，还能够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什么环境可以做到这一点呢？社会政策兜底，才能拥抱创造性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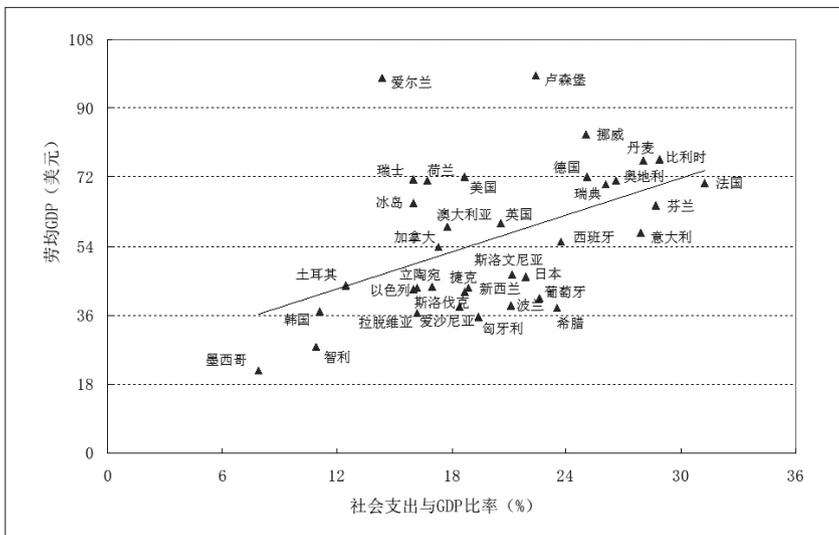


图 12: 社会政策兜底才能创造性破坏

过去我们说福利国家的时候，都会说从摇篮到坟墓是一个养懒汉的体制，看上去好像公平了，但是牺牲了效率。其实不是的，大家看图 12，横坐标是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实际上代表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纵坐标是劳均 GDP，就是劳动生产率。非常显著的斜率，表明社会福利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这意味着在社会层面把人保护起来，不让任何一个人失去基本生存条件，能体面地生存。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意味着不需要在企业层面保护任何东西，过剩的产能不需要保护，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不需要保护，过时的产业结构不再保护，过时的岗位也不需要保护。只需要保护人，这个保护人不在竞争层面，而是在社会层面。做到这一点，社会政策越兜底，我才越敢于去创造性破坏，最后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大家看图 13，横坐标是人均 GDP，纵坐标是政府支出。从人均 GDP1 万美元到 2 万多美元这个区间，是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最快的时候。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我们面临着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任务，这个任务既能解决后顾之忧，敢于生孩子；也能够

解决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问题；还能解决创造性破坏，提高生产能力，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的问题；还能扩大消费，避免我们过早地受到需求的制约。更重要的一条，国际经验表明，初次分配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但是有极限，基尼系数 0.4 以下的有比较好的收入分配。归根到底是靠再分配，这个再分配就要体现在福利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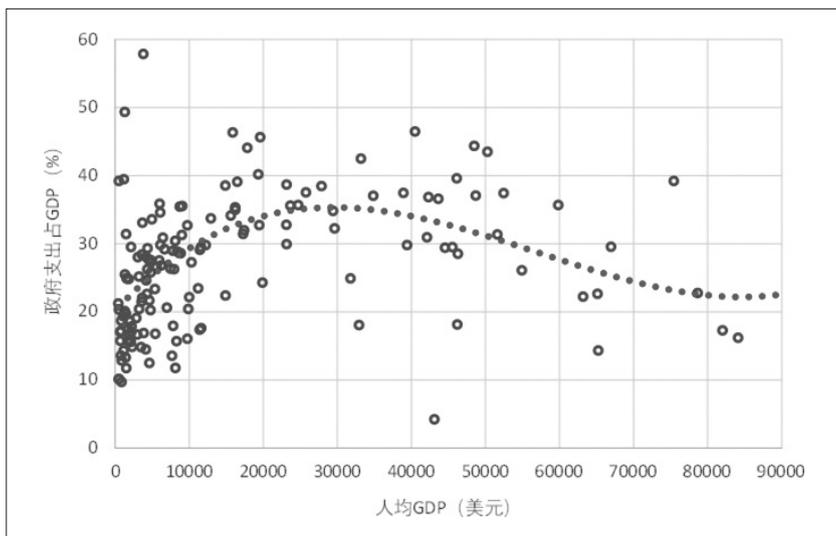


图 13：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建设

看人口变化的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应该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站在更高的长期发展

的框架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相关的方面都部署出来了。我这里只是增加大家的了解，或者说从经济学的角度做一个注释。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蔡昉院长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大家可能也会深切感受到，他表达的观点非常鲜明，叙述的条理很清晰。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特别讲到总和生育率比较低，超过很多人的预期。从人口的两个转折点分析对经济的影响，从三驾马车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最后他从比较高的框架来看怎么应对人口老化，提出非常鲜明的观点，我们要防止未富先老变成未富先滞，发展是硬道理，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请听众提出问题或者做一些评论。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或者说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的，大家可以自己打开麦克风，提问或评论。

左学金：蔡昉院长长期从事人口经济的研究，是我的老朋友了。以前我在北京听过他的演讲，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分析的宏观视角，很多人口学家是从比较官方的视角，而他是从宏观经济，从增长

率变化的视角。确实我们的经济增长像他刚才展示的那样，符合预测。今天他的演讲，从供给到需求，我们国家面临的未富先老，对我们国家人口问题做了很好的归纳。他最后提到我们国家要完善福利保障，使得我们企业的优胜劣汰进程不会因为社会保障不健全而不能彻底去做，以至于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我一直在研究我们社会保障的改进，但是从提高微观企业的竞争能力、减少后顾之忧这个角度，来谈提升国家的福利水平，我感觉很受启发。如果要补充什么，我想说我们的社会保障可能在未来若干年面临很大的财务危机，这个问题可能会和地方政府的很多问题胶合在一起，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可能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这是我个人一个不太乐观的预测。我们国家的生育率比较低，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负担太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人口的质量，我们国家目前整个的教育体制引起了全民的焦虑，从创新的角度可能不够，好大学比较单一，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教育要适应我们国家未来创新发展的需要。我只是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乔依德：蔡院长，你可以对左院长的评论再发表一些见解。文汇报的李炎提出一个问题，推迟退休年龄对前面讲到的这些副作用，有没有一个抵销的作用，或者说对经济增长有什么作用？

蔡昉：左院长讲得很好，我都赞成。未来养老的财务风险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预测，现行的制度将来是无法维持的，因为人口抚养比一定是变的。这里涉及养老保险的一些讨论，我不想进行这些讨论。我觉得，目前来说，做大蛋糕是重要的。劳动生产率是未来支撑老龄化社会的根本，它是最基础的东西。如果提高劳动生产率，你的劳动生产率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是完全可以抵消人口抚养比的负面影响的。第一，你要做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未来你要重新进行制度设计。我觉得这都是要做的。我刚才讲到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防止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一起下滑。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发达国家全都延长退休年龄了，任何老龄化国家不可能不走这条路。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其实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未富先老的特点。如果你画一条曲线，横坐标是劳

动年龄人口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纵坐标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发达国家这条线是横的，从 24 岁到 64 岁是水平的。对中国来说，从 24 岁到 64 岁，每增加一岁，人均受教育程度就降低。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随着年龄的提高，这些人没有享受到足够的教育。尽管我们教育存在问题，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暂且简单地用人均受教育线来表示，年轻一代人更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如果有好的就业岗位，他们是可以去。但是快退休的那些人，劳动力市场并不一定需要。如果能够通过培训，通过各式各样的制度，包括反歧视，各种措施都到位的话，延迟退休年龄何乐而不为？有一些微观的调查显示，很多人不想延迟退休年龄。但是现在已经退休拿养老金的人，相当多的人实际上在做一份工作，他只是想在养老金之外更加安全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任何政策都得有足够的配套，而不只是一个标准。

乔依德：有一个问题是说，蔡老师，你讲到农业部门还有 25% 的劳动人口。请问，这部分劳动人口如果转移到非农，可以产生多少人口红利增

量？如何促进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

蔡昉：如果你看统计年鉴，大体还有 24% 到 25% 的劳动力是务农的，但是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定义的问题，什么叫务农？现在农村很少见到青壮年劳动力在家里，只有少数人会兼顾家里的农活，可能被统计为农业劳动力了。根据我们的估算，我们倾向于认为再减 10 个百分点，或许现在只有 15% 的劳动力是真正务农的。即使这样，我们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是百分之三点几，我们有十几个百分点可以转移。中国 8 亿多劳动力，一个百分点就是 800 万，规模非常大。但是它的转移，不管怎么说，不可能一夜之间，或者短时间就转移出来的，是一个慢慢的过程。这需要我们推进改革，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创造各种流动的渠道，破除各种制度性的障碍，最终能够增加劳动力。确实可以创造一个小小的人口红利，虽然不可能回到历史上的机会窗口上去，但是仍然值得加快速度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乔依德：下面是刘建丰的提问，劳动份额有办法提高吗？

蔡昉：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份额，有时候会受到统计口径的一些干扰。但是我总的感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劳动份额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中表现出比较合理的趋势。前面我讲的，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成为一个城市居民以后，他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就进一步提高，他能够接受人力资本的培训，也可以提高收入，就业的稳定性也会提高，这些都会在初次分配中改善收入。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再分配一定要发挥出它的作用，才能实质性地把收入分配的差距降下去。否则，未来我们说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初步实现的时候，如果还是一个 0.4 以上的基尼系数，你就很难很硬气地说这句话。

乔依德：有一位听众提出，开放两孩，又开放三孩，人口生育政策多变不利于稳定人口结构。他的问题是，未来中国的人口应该稳定在什么水平上比较好？应该怎么预期今后人口政策？

蔡昉：这不叫人口政策多变，这是让人口发展走向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一个逐步放开的战略。其实我们也不可能把生育水平再回归到很高的水

平，1.8 是大家认为很好的，但是其实也很难做到。很多研究证明，整个国际上随着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生育率就是在下降，除了个别国家有一点小小的反弹之外，也没有什么逆转回来的趋势。所以它是一个基本趋势。现在我们都太可能改变未来中国人口的峰值了。但是未来人口的下降速度能够慢一些，这样人口结构就更加均衡一些。其实我们说了半天，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关心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改变不了太多。

赵广彬：我们有没有考虑放开四孩五孩，有没有考虑移民？

蔡昉：这个问题挺难。老实说，二孩之后，生育意愿也不是特别强。我们呼吁的时候，一直都说实行家庭自主生育。目前来看，两个孩子其实也够了，现在问题是很多人不生二孩。生了二孩的人才能生三孩，再往上升的时候，我们做人口的同事研究发现，真正生四孩是很少的。从微观的环节上，肯定是有，有人就想生；但是宏观的角度，可能这个影响并不是太大。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下子放开呢？这个我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也在加大引进人

才的力度，包括吸引我们自己在海外的人，包括吸引国际上的各种人才，我们都在做，这其实也是移民政策，我们还成立了相关的机构。大规模普通劳动力的移民，我个人觉得，可能一时半会我们很难接受。因为中华民族的高度统一性，形成了这么一个文化传统，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未来的考虑，目前很难考虑。

乔依德：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此结束了。我们再次向蔡昉院长的精彩演讲和干脆简洁的回答表示感谢，也感谢各位朋友参加今天的视频会议，以后也期待你们更多的参与，提出更多的问题，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